那也是我的村庄

读《地气——厉彦林散文选》

■ 刘 健

在外“当公家人”“吃国库粮”三十多年，厉彦林一直没改家乡口音。他的散文和诗，也是以家乡的声韵写成。很多作品被电台配了乐用普通话朗诵，而我默读时还是原汁原味原生态。

他笔下春天常住的村庄，青石垒砌的村庄，煤油灯照亮夜晚的村庄，也是我的村庄。

最亲切的，是他随手排比的动物、植物、农活、风土人情。那真是俯拾皆是，一写就是一串儿。

他把我们幼时的家乡景致一一召唤回来：韭菜、麦苗，地瓜、土豆，苦菜、荠菜、蒲公英、车前草，椿树、槐树、杨树、柳树、梧桐树，桃树、杏树、枣树、梨树、李树、栗树、柿子树、苹果树、石榴树，燕子、喜鹊、青蛙、萤火虫……

我想起来了，香椿香、臭椿臭，苦菜苦、茅根甜，刺槐枝扎人、绵槐条抽脸；我想起来了，槐花烂漫盛开时，撸几串儿非常顶饿；榆钱儿能吃，榆树皮剥下来也可以吃，就是太苦太涩了。奶奶把榆树皮剁得稀烂，泡水里一遍一遍滤出苦汁，然后使劲蒸煮，并且拌进三两颗黄豆压味儿。

这样的“原生态食品”，奶奶以前是吃惯了的，比我顺口。据率全家闯了关东的大姑说：在“三年困难时期”，爷爷奶奶、大姑二姑顿顿啃树皮，把仅有的一点果子（花生）皮留给家里唯一的男孩、也就是我父亲吃。幸运的是，他们全都活了下来。

我想起来了，小时候，我一出去撒欢儿就是一整天，不到天黑不着家。家长不用操心孩子中饭，我们自己会在野地里找吃的。春末夏初，小麦灌浆、颗粒渐渐饱满起来，我们揪麦穗烧了吃，嘴唇留下乌黑一圈儿。入秋，花生、地瓜、玉米快长成了，我们就拔花生、挖地瓜、掰玉米，躲进沟里架火烧。掌握不好火候，或者柴禾潮了，会冒起黑烟，把生产队看青的社员招来。

下功夫也能弄到荤腥：水沟里摸泥鳅，树底下挖知了猴，用夹剪捕鸟，最有营养价值的则是绿得吓人的胖豆虫。

田野里瓜快熟了我们偷瓜，偷甜瓜、偷梢瓜、偷方瓜，那时候还不兴种西瓜。果园里桃熟了杏熟了梨熟了，我们偷桃偷杏偷梨。看果园的大人，有时会带一瓶水，强迫正在附近狼窜、伺机偷摸的孩子们喝一口漱漱嘴吐地上，见有水果残渣就算抓住了“现行”……

想起沂蒙山一辈辈人的主食——地瓜。秋季收下来，大部分要切成瓜干儿，晾晒好囤起来；少部分鲜地瓜直接存进地窖，每顿切块儿、切条儿煮了吃到冬。鲜地瓜秧子不难消化，撕巴撕巴叶子和粗梗喂猪，嫩梗剁碎了煮煮当粮食。

切晒地瓜干儿，是一年里的重活儿。一块长条木板上留个口子装上刀，就是“地瓜推子”。手摁着地瓜唰唰地切，不熟练或者干急了，就会切破手，弄得鲜血直流！实际上，几乎人人都有失手的时候，一秋下来，男女老幼很少有手囫囵的。切完了，要选择地皮干燥的岭盖儿、农田或河滩，把瓜干儿晒起来。先大把大把满地撒，然后弯下腰把一片一片重叠的瓜干儿拨拉开。一面晒干了还得翻晒另一面，拿根棍儿一片一片挑起来翻个儿。过两天完全晒干了，要一片一片拾起来，挎个筐蹲地上边拣边挪，两腿酸疼腰也酸疼。如果赶上阴雨天，那就非常悲催，半干的瓜干儿收到室内马上发霉，长霉点甚至整个烂掉。刮一刮上面的白毛绿毛，照吃不误。

地瓜干儿除煮了吃，主要用来烙煎饼。半夜三更磨糊子，大人孩子一人抱一根磨棍，推着石磨一圈圈儿转。有时犯困，闭着眼在磨道里走，有时犯懒，光扶着磨棍不出力，一松劲把磨棍滑下来。父母则像上了套的牛，一步一步使足劲推。等天明，活儿就都是妈妈的了，她踡着腿坐在不足半尺高的鏊子跟前，一手往鏊子底下续柴一手在鏊子上滚糊糊，鏊子的高温熏蒸着她的脸和胸，糊糊在她手里变得滚烫。

在厉彦林的笔下，煎饼有许多种做法，也有许多种吃法，但说透了都是穷凑合，远不如蒲松龄吃的煎饼（竟然还要卷上鸡肉，抹上豆豉、猪油）有营养。

幼童时，我卷一根葱、捏上一溜盐末儿，扛着煎饼就跑出去疯。高中的时候，每星期背几十张煎饼和一瓶咸菜去住校。两个最亲密的同学，生活条件比我家略好，我带的是干炒的纯咸菜，他们俩一个的咸菜瓶里有点油，另一个的咸菜瓶里竟还有点肉。每顿饭我们把三个咸菜瓶子摆一起混着吃，他俩就这么委婉地照顾了我很久。

啊，如果不是厉彦林反复吟咏，我把这些都快忘光了。他至今都还爱吃地瓜煎饼，据说在孟良崮当过战斗英雄的老国防部长也爱吃。但我早已经“忘本”，如今一吃地瓜就反胃，只爱一种麦子面的高级煎饼。

对于小时候的我和厉彦林来说，麦子是梦幻中的植物。妈妈讲老套的童话故事：一个凡人，无意中救了一个神仙，神仙为了报答他，许诺帮他完成三个心愿。这人的第一个心愿必定是——送我一囤麦子！麦子，它能产出那么香甜、细腻、温柔的食物——馒头、花卷、饺子、油条、各种点心……

我们两人的家乡都是山岭薄地，一亩只能产麦子一百来斤。我记得，连续好几年，生产队每年每人仅分配十八斤麦子。除了留下春节、元宵、中秋等有限的几个年节包饺子尝一尝，剩下的那点麦子，父亲都背到集市上换成了瓜干儿。一斤麦子能换三四斤瓜干儿呢，吃饱远比吃好要紧。

是的是的，厉彦林的散文又让我记起顶着呼啸的寒风在深秋的原野干活，把所有的单衣都套身上还瑟瑟发抖的情景。记起老年人教我们的“经验之谈”：把衣裳一件件慢慢脱下来，再一件件慢慢重新穿上，然后就不觉得冷了。我试过，很管用！

自然条件本就恶劣，人又反反复复胡折腾，生活就像闭着眼在磨道里打转，没个尽头。

然而，好日子似乎一夜之间就到来了。地分了，人不整人了，OK！很快，麦子吃不完了，地瓜没人吃了，玉米也没人吃了，它们都被归类为喂牲口的“饲料粮”，洋布代替了土布，小纺车闲支在了屋梁上，电磨代替了石磨，摊煎饼也改用电动机械……

就在那个日子拐弯儿的时节，1980年前后，我和厉彦林先后走出了村庄。但他一直念叨着那片山和水，用一篇一篇文字接续着昨天，接续着地气。

在我的心里、他的心里，这山山峁峁上的一切都无可代替。我们就是被这样一方水土养大。我的小学老师就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正是他教会了我认字识数。

一遍遍回望的故乡，永不愿重新经历的年代。写下一个片段，就是一座纪念馆。

认识一点点英语单词也能读懂《傲慢与偏见》《歌剧魅影》《月亮与六便士》——

这只来自牛津大学的‘书虫’30岁了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蒋肖斌

80后姑娘李雷婷有一个双胞胎妹妹，给自己起了一个英文名安妮（Anne）。上中学时，她和妹妹经常省下早饭钱，去买一本本绿色封面的小书，安妮的名字就来源于其中一本《红头发安妮》。“从1997年开始读，那时只认识一点点英语单词，却发现能读世界名著！买了好多本，《傲慢与偏见》《歌剧魅影》《月亮与六便士》……”

不知广大80后90后是否回忆起了自己的中学时代？这套来自遥远的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书虫’系列，自1997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以下简称‘外研社’）引入中国，长期低调地占据‘老师、家长、孩子都愿意买’的课外书排行榜前列。

“4·23世界读书日”之际，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了‘书虫’系列的首任编辑詹妮弗·芭斯特，她回忆，‘书虫’首批12本在1988~1989年出版，30年过去了，系列图书的数量超过200本。

芭斯特说：“1988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担任编辑的玛丽·麦金托什认为，有必要出版一套全新的分级读物，不论是设计还是内容，看上去都要像‘真正的’图书，而不是学校用书。于是，她与学者特丽西娅·赫奇合作推出了‘书虫’系列语言大纲，在精心考虑的分级方案中，编写出读起来非常自然的文本。”

系列丛书的名称也经过了多番讨论。“bookworm”（即书虫）的本意是“钻木甲虫的幼虫”，非正式意思是‘喜爱阅读的人’。“你猜，人们首先会想到哪个意思呢？”芭斯特笑着说，“最终，‘书虫’这个名字被选中，因为它更有趣、更迷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逐渐兴起了英语学习的热潮，然而当时适合我国读者的英语读物极为短缺，英语分级读物更是空白，正好，‘书虫’来了。

外研社综合英语事业部总经理姚虹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当时外研社已经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引入了《牛津双解初级英语学习词典》等英语学习工具书。双方沟通后认为，‘书虫’系列分级读物分级科学、语言经典、主题丰富，非常适合中国读者的需求。”于是，1996年，外研社决定引进‘书虫’系列；1997年，第一批50本‘牛津·书虫英汉双语分级读物’正式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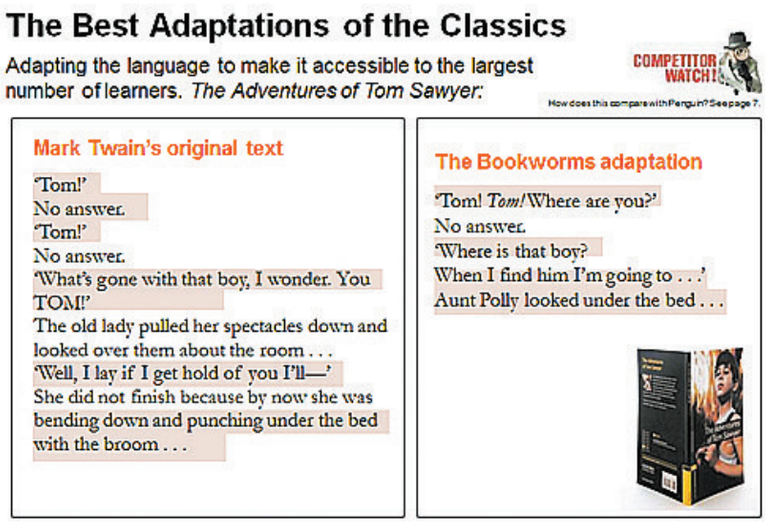
第一批来到中国的‘书虫’共6个级别、50本读物，大多是西方经典简写本，包括《简·爱》《双城记》《傲慢与偏见》等文学名著，《弗兰肯斯坦》等科幻名著，还有《威廉·莎士比亚》等名人传记。

李雷婷记得，当时在书店里无意发现‘书虫’，如获至宝——不用翻又厚又晦涩的书，就可以看完一本世界名著——还是英文的，感觉自己‘学富五车’。尽管后来，她几乎再没有读过英文小说，除了《红头发安妮》和《简·爱》的原著，‘因为有一种情结’。时隔多年，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还对当时那本书的纸张记忆深刻，‘有一点皱皱的，没那么光滑，有点偏黄……’

尽管家长和老师大都是抱着让孩子好好学英语的初衷推荐‘书虫’的，但名著之所以是名著，一定有其神奇的魅力，超越时间、空间，以及语言。有多少人是通过‘书虫’打开了世界文学名著的瑰丽宝库的——感谢外研社在引进这套书时配了中文译文。

姚虹说，为了保证系列读物同时推出，当时外研社一共找了48位译者。因为‘书虫’是以语言和文化学习为目的的双语读物，翻译自由度有一定限制，不能根据译者个人语言风格随意调整，译者只能‘戴着镣铐跳舞’。

外研社在页面设计上，特别选择了左右页中英文对照的形式，这给编辑增加了编校难度，但从后期读者反馈来看，这一努力非常有价值。有不少性急的读者纷纷表示，当时着急知道结尾，忍不住就先翻中文，再慢慢看英文。



原著文本（左）与‘书虫’的语言对照

大学学了古代文学专业的乐琪，是“书虫”的真爱粉，买了几十本，‘妈妈对我寄予厚望，但其实我看中文比较多。对很多孩子来说，这就是欧美文学的启蒙’。

28岁的山东姑娘小奕从初中开始读‘书虫’，最初的目的也是‘提高英语成绩’，但最终的结果是‘提高了语文成绩’。“当时看完了《呼啸山庄》的书虫简版，觉得不过瘾，就去买了中文全版，每天睡前能看好久。”小奕说，‘作为山东的考生，难得有课外读物是可以看了过瘾，又在家长和老师眼中是对学习有帮助的。’书虫‘就是中学时代的宝贝！”

“书虫”系列分入门级和1~6级，共7个级别，不同英语程度的学生，总能找到适合自己阅读的那一本。不过，把大作家的名著变成只有几百词汇量的孩子就能阅读的文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牛津大学出版社产品经理应蓓华介绍，‘书虫’系列的编辑均为母语编辑，且都十分资深；电影、传记等不同类别的主编，也都是各方面的专家。

“‘书虫’的作者都是杰出的故事大王。他们熟悉每个级别的词头词（词典中有释义的单词，英语学习每个阶段的学生都应该学会这一级别的词头词——记者注）、语法大纲，即使在入门级，都能够用朴实的英语单词和精炼的语法，表达出丰富的故事情节。”应蓓华说。

芭斯特强调，重写经典小说并不仅是简化语言和缩短长度。‘成功的改写，首先要遵守的原则，就是符合原著中作者的原意。所以，必须详细分析原著，包括其叙事结构、人物描写、修辞格……之后，改写者要建立一套全新的叙事结构，遵守‘书虫’系列各个分级类别的用词原则，根据原著的核心精神，创建全新的文本。”

芭斯特坦言，在改写的过程中，难免丢失一些细节，比如，勃朗特小说中对风景的诗意描述、狄更斯小说中的一些小人物，‘但‘书虫’一直致力于忠实原著的精髓’。

芭斯特一干就是25年，直到2014年才退休，保证了‘书虫’系列编辑的连续性，接替她的是现任编辑雷切尔·布莱登。

布莱登也表示：“我们从不增添或修改故事，但会缩短。在改写像狄更斯的《小杜丽》这样有很多故事情节交织的小说时，我们在不影响故事完整性的情况下，可以省略一些内容。”

就这样，这只从英国牛津大学来的“书虫”，牵着中国孩子懵懂的手，一步一步踏入世界文学名著的殿堂。如今，‘书虫’30岁了，来到中国也20年了，在中国累计出版191本，销量超过1亿册。

80后、90后也长大了，小奕的先生已经把‘家藏’的几十本‘书虫’都从山东千里迢迢运到北京，打算给未来的孩子启蒙用，‘这里的故事不会随时间而过时’。

中国纪录片‘院线时代’到来了吗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吴晓东

“作为一匹市场黑马，《二十二》取得全球纪录片票房冠军，这说明中国纪录片院线时代已然来临，中国电影市场拥有足够空间接纳纪录片。”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日前发布的《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8》指出，2017年，国产纪录片产量大幅度增长，营利能力显著提升，国产纪录片市场逐渐破冰见暖。

从这本被业界称为“蓝皮书”的报告中，国产纪录片再一次传递出利好的消息。

“对比近几年的数据，会发现中国纪录电影发展正在提速，2017年迎来拐点。”《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8》主编、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教授说，2009年，《牛铃之声》敲开了韩国电影院大门，2013年，《看见台湾》敲开了台湾电影院大门，“我一直期待一部国产纪录片在影院证明自己的实力，我坚信中国电影银幕留有容纳纪录片的空间。《二十二》证明了这一点。”

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12年，国产纪录片进入院线市场的仅有两部，合计票房130万元，而当年的国产影片院线票房总数为170亿元。

而5年后的2017年，10部进入院线公映的纪录片总票房累计收获2.63亿元，《二十二》独揽1.7亿元，创下中国纪录电影票房新纪录，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票房破亿的纪录片，《地球：神奇的一天》《重返·狼群》分别以4778万元、3300万元位居年度中国纪录片票房榜的第二和第三。同一年出现3部票房超过3000万元的纪录电影，这在中国电影史上还是第一次。

《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8》称，2017年的国产纪录片产量创下了近10年来的历史新高，获得公映许可证的总量较前一年增长51.7%。而根据2017年度在原国家广电总局备案的纪录片项目数量来看，2018年的产量将迎来更大幅度的增长。至2017年，纪录片票房总量已连续5年不断上升，《二十二》的爆发更是直接拉升了纪录片的社会关注度。

以1.7亿元的票房开启中国纪录片院线时代的《二十二》，是80后导演郭柯拍摄的一部低成本、小制作的纪录片。作为中国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片中22位慰安妇都已进入耄耋之年，这些影像具有不可复制的历史价值，这个话题留有足够的历史、文化和人性空间。“按照纪录片的传统套路，可能会在电影节上赢得一些奖项，在学术空间举行一些观摩放映，然而，《二十二》却实现了票房奇迹，并成为焦点话题，可见，纪录片的院线空间是存在的，但如何到达观众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张同道说。

近年来，随着政策的支持和商业运作的不断尝试，虽然纪录片逐渐带动起中国观众的视听胃口，观众群体在逐年扩大，但对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纪录片仍被视为属于在电视上观看的免费资源，这也是一些口碑颇高的纪录片进入院线却票房低迷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一直以来影院系统习惯采取粗放式经营，把有限的资源都给了更有娱乐性的商业大片，纪录片即使千辛万苦挤进院线，“影院一日游”或极低排片率的尴尬也屡见不鲜。因此业界有人认为，以最近的几部片子断言“纪录片的春天来了”或许为时尚早，这并不能说明所有的纪录片都会赚钱，《二十二》的纪录片属性其实也并非是其表现出色的原因，创作题材如何能够引发社会的集体关注或许才是下一步大家应当思考的问题。

院线能否拯救纪录片？近年来业界声音不断，但颇有共识的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是纪录片院线化当前面临的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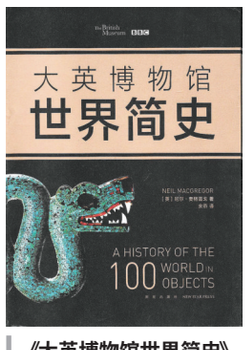
就在大多数纪录片落寞走上国内院线的时候，国际电影市场上的很多纪录片却是座无虚席，人们排着长队前去观看。2014年年底，韩国的纪录电影《亲爱的，不要跨过那条江》成为韩国有史以来商业上最成功的独立电影，甚至超越了同期上映的好莱坞商业片；而在美国，每年约有百余部纪录电影在院线放映。相比之下，国产纪录电影的市场之路还很长。

“谁将是下一部《二十二》？答案谁也不知道。对于具体作品来说，不确定性和随机性依然大于必然性。”张同道说，但《二十二》对整个纪录电影行业的拉动作用是毫无疑问的，它将开启“后《二十二》时代”的大幕。

书架

人类来路的100个脚印

■ 陆晓娅



《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
[英] 尼尔·麦格雷戈著
新星出版社

吃完晚饭，文轩三步并作两步回到教室，赶在别的同学之前，从图书角把那块‘砖头’抱回到自己的课桌上。他将这本厚重的书打开，一头扎了进去。今天，他希望能在上晚自习之前看完3个篇章。他没想到这本离他的生活似乎非常遥远的书，仿佛有一种魔力，让他欲罢不能。他知道读这本书不能给自己的高考加分，却模糊地感觉到，这块‘砖头’为自己打开了一片新天地，那会让他在上了大学之后，获得更强的学习动力。这本书不仅让他‘知道’了很多事情，而且奇妙地在不同的知识之间搭起了桥。他突然觉得学习不再是一个‘苦活儿’，而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他仿佛看到了一个新的学习者，这个学习者像个侦探，并不满足于知道了什么，而是不断地追问‘为什么’。这‘为什么’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让思维从一个个孤立的、静止的、需要死记硬背的‘知识点’跳出去，变身为一个妖冶的家伙，迎风招展，呼朋引类，飞扬激荡，最终，把自己带向事物的深层结构、动态过程、相互作用，走入一片美丽新世界……

嗯嗯，对不起，我得打住了，以上纯属我的虚构！胡编乱造这么一个场景，全是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太贵了（168元），大概多数家庭买不起，所以我希望它能出现在学校的图书馆里，最好是班级的图书角里，这样更多的学生就能把它抱在怀中，像我假想的主人公一样大快朵颐。

这块‘砖头’乃大名鼎鼎的《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我写下这篇文字，并非因为它名头太大，而是因为我深感通过阅读它，学生们可以补上非常重要的一课：思维方式的提升与转变。

前两天在朋友圈看到一位搞历史的朋友说，她青年时代的遗憾之一，就是从高中入大学，没有很快转化思维方式，学习能力太差。

是的，学习能力与思维方式，会直接影响到一个人高考后的人生。要知道，高考通常在20岁之前就完成了，之后如果没有意外，你还有漫长的人生要过。如果你在高考前不得不功利性地按照能得高分的策略学习的话，那么请一定记住，决定你的后劲的，不是那个分数，而是你对学习的热爱和你的学习能力、你的思维方式。“方法论”，这可能是一门没人为你开设，却能让你活出不同人生的课程。至今，我无比感谢小学自然课的郭振昌老师，他居然给我们这些小屁孩讲‘优选法’和‘统筹’。我想我这一辈子活得相当丰盛，是因为早早就把系统思维植入了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

当然，你可以直接去看一些与思维方式有关的书，不过，遇到了这块“砖头”，我发现只要稍微用点功，它可以帮你在知识与思维方式上兼得。

《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这块“砖头”，是100块“小砖头”——100件文物组成的。北大教授陈平原在《大英博物馆日记》中记录了这样一个场景：一群中国游客在博物馆大厅里高谈阔论：“这算什么宝贝？比咱们故宫差多了！”在他们眼里，博物馆是藏宝洞，而不是人类的知识库。如果用这个标准，《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所选择的100件文物，恐怕在他们眼里耀眼的不多。然而，当大英博物馆的专家们决定‘通过文物来讲述历史’时，这些藏在博物馆各个角落里的文物，开始显现出它们的非凡价值。

这100件来自世界各地的文物，见证了在过去200万年中，人类是如何塑造世界，同时又不断被世界塑造的。在专家们眼里，这些“物”与‘人’息息相关。他们会描述文物的外形（WHAT），但是更会问一连串的‘为什么’：它为什么是这种形状的？它上面为什么会有图案和几种不同的文字？制作它的材料为什么来自数千公里以外？为什么它会在这里被发现……除了“WHY”，还有“WHO”、“WHEN”、“HOW”。顺着这些‘W’深入开掘，一幅幅人类生活的生动景象、一段段文明演化的曲折进程，就显现出来。

就拿书中介绍的一件历史最久远的文物‘奥杜威石制砍砸器’来说，它实在是太不起眼了，可是专家们告诉你，当把它握在手里时，它的重量、它与手掌的高度贴合、它锋利的边缘，都令人想到我们的祖先是如何用它从动物身上剥肉。而预先制作工具备用，正是我们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工具帮助人类得到动物身上最富营养的骨髓，从而促进了人类大脑的发展。“这只砍砸器记录了我们明显变得更聪明的那一时刻：不只想制造物品，还要改进它们”；‘是制造让我们成为人类’——由一块灰不溜秋的石头，铺陈出人类进化的关键时刻，多么精彩！

人类还在演化着，当人工智能开始进入我们的生活时，世界会变成怎样？要面对愈加复杂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或许跟着《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所提供的脚印，把人类的来路走一走，就会少一点莽撞，多一点智慧吧！